

# 不守常规的龙天庙

孙 琨

晋源有座龙天庙，位置在明太原县城南门外。龙天庙坐南朝北，庙门为过街楼样式，门上悬匾匾“龙天庙”。进入庙内，南北长，东西窄。正面是刘王殿，正殿两旁各有一偏殿。两殿之前各有古柏一株。东、西厢房约15米。前面各有古槐一株。北面乐楼与西殿相对，乐楼下中间开设庙门。

仔细打量，发现这座“龙天庙”与中国古建筑做法确实不一致。

第一，正殿两旁的偏殿明显不对称，东殿比西殿宽好几米。第二，钟鼓楼均为悬钟，不设鼓架。第三，龙天庙的正殿匾额上写的却是“刘王殿”。

这些特殊之处，原以为是地势所致。庙宇东面是民居，西面紧邻道路，当初建设，可能是因地制宜。

寺庙是中国古建中比较讲究的地方，中国古代建筑在平面布局方面有一种简明的组织规律，这就是每处住宅、官殿、官衙、寺庙等建筑，都是由若干座建筑和一些围廊、围墙之类环绕成一个个庭院而组成的。这种庭院式的组群与布局，一般都是采用均衡对称的方式，沿着纵轴线(也称前后轴线)与横轴线进行设计。比较重要的建筑都安置在纵轴线上，次要房屋安置在它左右两侧的横轴线上。这种布局是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和礼教制度密切相关的。“龙天庙”明显打破了这种布局，在古代那种严格的尊卑有序的体制下，为什么会有这种奇特的建筑规制?又为什么会延续几百年的历史呢?

庙内大殿前有介绍，讲述了龙天庙的历史由来。原来此庙供奉的是西汉文帝刘恒。

清道光《太原县志》记有“龙天庙，在南关，七月七日祭”的记载。“帝王”篇中记载了“汉文帝讳恒……初立为代王，都晋阳……祭人立庙祀之”。当地百姓代代相传，龙天庙是祭祀汉文帝刘恒的家庙。《史记》记载：“高祖十一年(196)立中子恒为代王，都晋阳。”七岁的刘恒当年来到晋阳，在这里治理代国17年。他轻徭薄赋，发展农业，社会稳定，深得晋阳人民的敬重与热爱。公元前179年，刘恒回长安继位天子，又开创了汉代“文景之治”的伟业。就在他做皇帝的23年中，他又四次回到晋阳看望旧臣。《史记》中记载“因幸太原，见故旧群臣，皆赐之。举功行赏，诸民里赐牛酒”。

文中介绍，太原县过去天旱乡民拾龙王祈雨，乡人抬上龙王要抬到“龙天庙”，众乡民跪拜上供，嘴里还要念叨“代王，代王，代王，我来也”。

这样一位有德、有绩，又有恩于晋阳百姓以及天下人的皇帝，晋阳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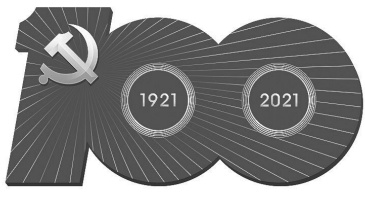
我揣测，晋阳百姓知道感恩，在建造纪念汉文帝的庙宇之时，亦采取了汉文帝在位时不扰民、不拘泥于陈规陋习的革新政策。龙天庙估计是建造大殿在先，东偏殿开工后，西偏殿若要与东偏殿一致，公路将要改道。晨钟暮鼓是寺庙中的标配。但是在汉魏时期，报时方式却是晨鼓暮钟，汉代击鼓迎春，是因为鼓声振奋，催人劳作。汉文帝在位，给晋阳百姓留下不尽的怀念，纪念他的庙宇如果是振奋之声，似乎与百姓心情不符，所以按汉时习俗，全部悬挂大钟，不设鼓架。

龙天庙的这种做法，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可能没有反对。站在今天的庙宇前，我们都能想象当年的疑问。晋阳百姓两千年来在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对这块土地的撞击中，成为一个极具个性的群体，勇敢、剽悍、行侠仗义，认准的事情无所顾忌。但厚重的历史积淀让晋阳先民有着充足的理由去按照自己的思路建设这座庙宇。龙天庙的建造如果按照通常规制，要拆民居、占道路，纪念汉文帝的活动变成与汉文帝思想相悖的行为，恐怕正是晋阳先民们不愿看到更不愿做的事情。聪明睿智、知道感恩的晋阳先民们，正是按照汉文帝的治国方略建造了这座庙宇来纪念他。很可能也是利用这种思路应对非议。

当然，以上种种，只是我一己之见，不揣冒昧，写成此文。

# 难忘的谈话

牛新凯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党在我心·锦绣太原”征文

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 太原日报编辑部  
太原文学院 太原市作家协会 联办

1948年春，中国革命进入伟大的转折时期，解放战争已由战略性防御转向全国战略进攻。为了争取全国解放的胜利，转战陕北并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和中央军委机关，由陕北向河北平山县转移，3月26日，到达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山西兴县蔡家崖。

4月1日，毛泽东在蔡家崖作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肯定了晋绥的党组织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指导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也是成功的，还肯定了晋绥党组织纠正土改工作中“左”倾偏向的成绩。特别是毛泽东就全国的革命形势和党的工作作了精辟的分析，郑重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以及党在土地革命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为晋绥和全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4月2日，毛泽东应晋绥分局领导和晋绥日报社总编辑常芝青的请求，在蔡家崖晋绥军区司令部大院的南平房接见了报社编辑人员。这一天大家异常兴奋，在总编辑常芝青的带领下，阮迪民、李超、张友、杨效农、田允中、李蔚然、胡正、陈蝉鸣、鲁石、胡也、苏光、纪希晨、王雷行、江涛、高丽生、甘惜分、水江、宋萍、董泯敌等20人，一大清早就从报社驻地高家村奔赴蔡家崖，静静地坐在房间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幸福时刻。

大约10点钟，毛泽东来到接见室，陪同的有贺龙、陆定一、张子意等领导人。毛泽东满面红光，精力充沛，头戴带耳的灰色毡帽，身着褪色的灰棉制服，脚穿一双深灰布棉鞋，脖子上围着一条约陕北的羊毛围巾。毛泽东握着常芝青的手说：“芝青同志，听说你是大学新闻系毕业生，看来很有学问，有点马列主义嘛！”领袖风趣而厚爱的问话，立即驱散了常芝青的紧张拘束。常芝青向毛泽东逐一介绍了参加接见的编辑、记者。

落座后，毛泽东用洪亮的声音说：“办报，你们是先生，我是学生，先生不了解学生，对学生就不会出题目嘛！”此时，常芝青把早已准备好的请示纸单呈上去，毛泽东认真看了后，说：“好啊，你们一共提出了六个问题，我们大家共同探讨吧！”

毛泽东首先谈到在报刊上宣传党的政策问题，他说：“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

毛泽东接着就报纸的作用和任务作了阐述，他说，马恩列斯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奋斗。报纸的作用

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当毛泽东看到常芝青提出“关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问题”时，他侧身对贺龙说：“党中央早就起草了一个党内指示和重印了1933年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小册子一起发下去了，你们没看到？”贺龙回答：“收到了，还没有向下传达。”毛泽东提高声音严厉地说：“难怪你们晋绥土改整党中出现‘左’的偏向！在我们一些地方的领导机关中，就有这样一些人，觉得党的政策只要领导人知道就行，不需要让群众知道。这是我们的工作不能做好的基本原因之一。”

毛泽东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后，提出了解决的办法，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上要从思想上进行群众路线的教育，同时也要教给同志们许多具体办法，就是要充分地利用报纸。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毛泽东指着常芝青说，同志们啊，你们的工作，就是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这样报纸才能办好，才能有生气，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

毛泽东问常芝青：“你们报社有多少通讯员？每天能接到多少来稿和来信？”常芝青汇报：“报社在各地设有专职通讯干事，全解放区有1200多名，每月最多收到来稿2000多件，不少分局、区党委、地委和县委的领导干部还亲自动手给我们写稿。”

毛泽东时而站起，时而坐下，时而抽烟，时而喝水，他话锋陡然一转，谈到《晋绥日报》的具体情况：“你们的报纸去年6月地委书记会议之后，有很大进步。内容丰富，尖锐泼辣，有朝气，反映了伟大的群众斗争，为群众讲话，我很愿意看。但是从今年1月以后就不够泼辣，材料也少了，使人不大想看。”

常芝青听了毛泽东的话，十分惊讶！毛泽东每天在陕北转战，胸中自有百万雄兵，指挥着全国的解放战争，日理万机，依然关注着《晋绥日报》的一篇报道、一则通讯、一段按语，这是多么巨大的关怀！而且分析得洞悉表里、透彻清晰。

常芝青向毛泽东简明扼要地汇报了报社最近总结整顿工作的情况。毛泽东微笑着说：“你们做得很认真，有成绩，也难免有缺点。你们采用编者按语的形式很好，但有时把话说得太满了，把弓弦拉得太紧了。拉得太紧，弓弦就会断。古人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现在‘弛’一下，同志们会清醒过来。”毛泽东说着站起来走到屋子中央，摆出拉弓射箭的架式，笑着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就如同射箭，有张有弛才能把箭射出去，射中靶子，有张无弛，射不出箭，还会把弓弦拉断。”

毛泽东甚至谈到改正报纸上的错别字和表述不明确或吞吞吐吐的问题。

这次谈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临结束时，常芝青鼓足勇气，请求主席为报纸题写新的报头并题词。毛泽东握着常芝青的手爽快地点了头。

这次谈话，毛泽东对党报的任务和作用，党报工作的原则、立场和办报路线以及党报应该具有的战斗风格，党报队伍的革命化建设等一系列基本问题，都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全国解放后，毛泽东的这次谈话编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这就是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多年过去了，常芝青每次回忆那一段美好的情景，总感觉是终身的幸福和殊荣。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这样评价薛瑄：“明代醇儒，瑄为第一。而其文章雅正，具有典型，大致冲澹高秀，吐言天拔。有德有言，瑄足当之。”近来笔者在读《薛瑄全集》时，发现他写有关于天津和潞河的四首时。

薛瑄，字德温，号敬轩，谥文清，山西运城人，生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卒于明天顺八年(1464)。他出生在一个教育世家。青年时代的薛瑄，一直辗转随侍其父于任所，受到其父儒学思想的影响。明永乐十九年(1421)，薛瑄中进士，登上仕途，历任湖广道监察御史、云南道监察御史、山东提学佾事、大理寺左少卿、大理寺卿、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阁预机务等职。歿后赠礼部尚书，从祀孔庙。他还提出过“为政以爱人为本”的“重民”“爱民”思想。

薛瑄写的有关天津的几首诗，具体时间不可考，大致是作于明永乐十九年(1421)至明景泰八年(1457)

# 薛瑄咏津

金 琬

间的为官时期。他所作的《直沽舟中》五言诗，抒发了自己当时乘舟行在水中的心情：

“潮来两岸平，风顺一帆情。海阔浮云白，天低野树青。久切持芥客，非是弄孳生。岱岳行看近，秋高气一登。”

《早过天津即直沽》诗云：“烟收泽国晓天晴，日出扶桑万里明。二水交流东海阔，一城雄镇朔方清。连云风送孤帆远，失岸湖随大舶平。借问关门来往客，不知谁是弄孳生。”

弃孳生，典出《汉书》卷六十四下《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列传第三十四下·终军》：“终军字子云，济南人也。少好学，以辩博能属文闻于郡中。年十八，选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太守闻其有异材，召见军，甚奇之，与交结。军揖太守而去，至长安上书言事。武帝异其文，拜军为谒者给事中。”“军为谒者，使行郡国，建节东出关，关吏识之，曰：‘此使者乃前弃孳生也。’”弃孳生，本指西汉外交家终军，后泛指年少立大志之人。

此外，薛瑄还写有关于乘舟潞河的两首诗，潞河也称白河、北运河。《潞河舟中》诗云：“岁月忽如昨，三年又此来。水长通御苑，山近绕金台。谿拟传心学，惭无济世才。永怀清不寐，终夕望三台。”古代有灵台、时台、囿台，合称三台。汉许慎所撰《五经异义》载：“天子有三台，灵台以观天文，时台以观四时施化，囿台以观鸟兽鱼鳖。”薛瑄在另一首《寒食日舟至潞河》诗中云：“客里又逢熟食节，扁舟初及潞河时。花村酒肆青帘出，柳径秋千彩索垂。心赏渐非年少乐，风光犹起故园思。孤舟尽日推篷坐，目送春流自咏诗。”可见，薛瑄在寒食节(又名熟食节，在清明前一日或两日)这一天乘舟至潞河，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沿河两岸的酒肆，柳树垂青里透着浓浓的春意，勾起了薛瑄的诗兴。

旧日，乡村中给孩子起名字时，以数字打头者极为常见。有大毛挑头，然后二毛、三毛……一直排到六毛的；也有从牛儿叫起，二牛、三牛……有人家排到五牛，有人家排到七牛、八牛，更有人家排到十牛的；还有叫大宝、二宝、三宝、四宝；二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小；赖小、二赖、三赖、四赖；棉小、二棉、三棉、四棉；花花、二花、三花；改变、二变、三变、四变……上述名字，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即以长幼为序，排行为序。

名字，作为一个符号，对于旧日的大多数农家人来说，只要叫应就行，并不会、也没那个条件刻意去追求高贵、文雅；而且，当时的社会也没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名字随时都可以改。因而，一般人家，特别是庄户人家，给孩子起小名时，十分随意。加上当时生育不受限制，不少人家孩子多。对于不识字的老农来说，给第一个孩子起名字时，也许还操点心。随后而来的，按顺序叫便成了最方便、最省事的起名办法。日后，当这个孩子长大了，有出息了，另外再起个好听点的大名(学名、官名)就行了。然而，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太少了。于是，这些个以排行数挑头的名字，也就只能陪伴此人终身。而在乡村中，这样的名字也就比比皆是了。

那么，在农村中，数字打头的名字，是否都代表其排行呢？不，也有例外。同样在我们村，高姓、郭姓、雷姓，还有我们郝姓，有好多个叫九斤、十斤，甚至十二斤的。若按上一节所叙，这些人应该排行第九、第十，或第十二了。然而，这四五个叫九斤的，实际上都是老大。据说，他们的名字是与出生时的体重有关。但是，以前真有这么重这么重的新生儿婴儿吗？

有一种说法，当年婴儿出生后，当爷爷奶奶的、当爹爹妈妈的，也想知道自己的孩子是几斤几两。但囿于条件所限，他们便找个箩头，里面垫些布片，将孩子放进去称一下。据说，那个九斤，便是连箩头称后的重量。一只箩头，大约三四斤，而孩子大约是五六斤。且不说这个九斤并不是孩子的实际重量，就是连箩头一块称，也不可能齐刷刷都是九斤呀。这里面，应该是还有一些另外的原因的。

九，是个位数中最大的一个，在古代中国人的眼中，这是个表示极限的数字，常被看作最多、最大、至尊，因而也是个备受尊崇的数字。同时，“九”“久”同音，九又有长久、长寿之意，是个极为吉祥的数字。因而，无论这个孩子的实际重量是几斤，也不论连箩头称时是多于九斤，还是少于九斤，取名时，便将孩子叫成“九斤”了。这个名字，其实饱含了长辈的一些美好寓意在里面。

由于老大叫成了九斤，再有孩子出生，顺理成章，就成了十斤、十一斤、十二斤，既与排行无关，更与体重无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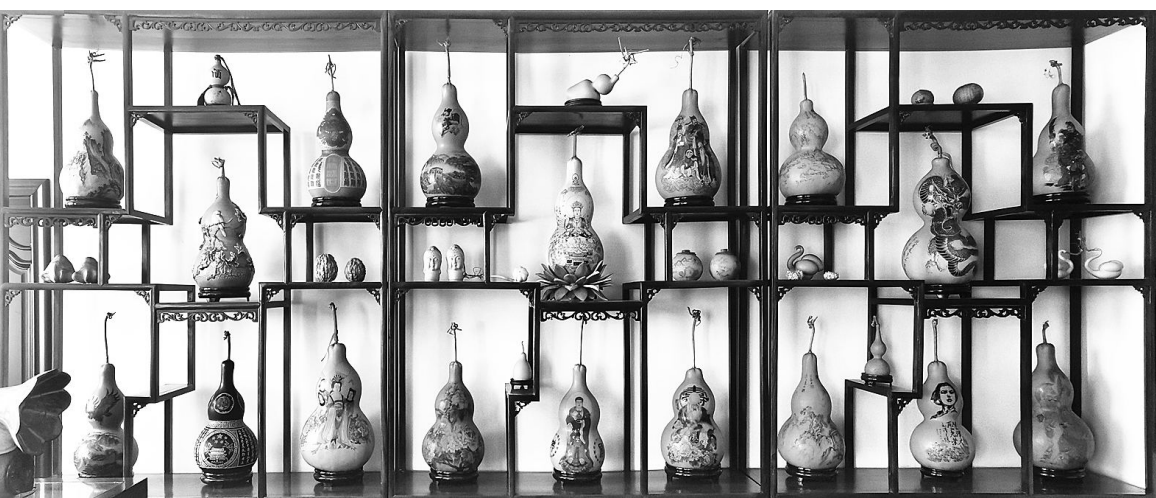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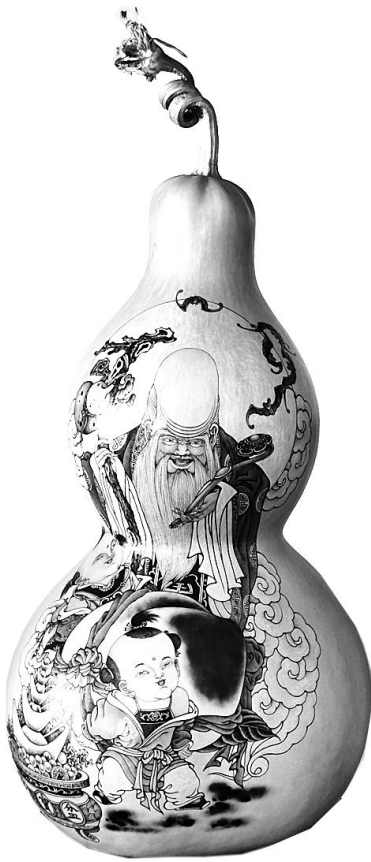
# 烙画葫芦

在近期公布的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吕梁市文水县葫芦制作技艺入选。

文水葫芦制作技艺源远流长。2006年，吴村的刘石安和薛改莲成立烙画葫芦协会，开展种植管理、技艺培训，这一古老的技艺得以发扬、繁荣，也使这平凡的农家瓜果登上了艺术的殿堂。烙画葫芦这一技艺以葫芦为载体，以烙刻为手段，辅以针刺、彩绘、镂空、浮雕等工艺，注重“意在笔先、落笔成形”，突出“以铁为笔，以火为墨”的艺术特征。运用勾、勒、点、染、擦、白描等手法，可以烙出丰富的层次与色调，能保持中国传统绘画的民族风格，达到艺术和自然生物的审美结合。凭借纯朴的感情和直觉创作，形成了葫芦工艺品浑厚、单纯、简洁、明快的特殊风格，给人以古朴典雅、回味无穷的艺术享受，有“绿色工艺”之称。

葫芦谐音“福禄”，是中国文化中的吉祥物之一。吴村葫芦以其独特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在中国葫芦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吴村葫芦艺术，主要以针刺、烙画、彩绘、掐丝、堆彩、镂空、浮雕、推光漆等工艺技术，在葫芦上雕刻出八仙、罗汉、菩萨、八骏、五牛、花鸟、山水风光等吉祥艺术图案，产品玲珑剔透，惟妙惟肖，缩名山大川于盈寸之间，移嘉卉奇葩于掌心之上，刻人物形象于器物之上，赏心悦目、养性怡情，可谓“胜于金玉”，堪称民间艺术一绝。现在，他们的作品又融入了中国梦、“一带一路”、英雄人物等现代元素，成为民间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梁大智



# 杨家沟豆腐

王润云

“冠山杨家沟，家家做豆腐，皮嫩细又白，赛过杨贵妃。”这是流传在阳泉市平定县冠山镇一带的顺口溜。

杨家沟村是平定县城边上的一个小山村。传说，杨家沟村人的先祖们，以种植谷子、黄豆等农作物为主。有一天，人们都上山干活去了，忽然下起大雨来，晾晒在场上的黄豆被雨水浸泡得发胀了，人们舍不得丢掉，又怕很快发霉腐烂，只好把黄豆磨成浆糊，拣了豆皮，想放进锅里煮熟后，慢慢食用。因为手忙脚乱，误把泔水叶菜的浆水倒进了锅里，放冷后奇迹出现了，竟凝结成块，吃起来更加美味可口。住在这里人中有从淮南来的，发现这东西和淮南盛产的豆腐很是相像，便也名之曰豆腐。后经过历代祖先们的不断摸索，定型为盐卤点的北方豆腐，又称“北豆腐”。在杨家沟村，至今人们还把点卤这道关键的工序称之为下浆。

杨家沟豆腐的主要制作工具有石磨、筛子、簸箕、滤渣包、螺旋杆、大铁锅、豆腐包、豆腐缸、成型架等。特别之处是，大铁锅盘在炕洞里，煮豆浆的时候用的是炭火。

撑船打铁做豆腐，出了名的苦行业。这句平淡的民间俗语，包含着做豆腐过程中的艰辛和不易。在平定，曾有一家杨家沟豆腐坊的对联经久流传：“一轮磨上流琼液，百沸汤中滚雪花。”此联出自明代诗人苏秉衡写的《豆腐诗》，形象地再现了豆腐的制作场景。

杨家沟豆腐又称“贵妃豆腐”，以白嫩、柔韧、煎炸炒煮不变形、口感美味著称，为人们所喜爱。

晋之味

# 趣说『九斤』及其它

郝妙海